



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主编

郝振省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编辑生涯忆鲁迅

赵家璧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主编

郝振省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编辑生涯忆鲁迅

赵家璧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编辑生涯忆鲁迅 / 赵家璧著.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3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 郝振省主编)

ISBN 978-7-5604-4320-1

I. ①编… II. ①赵… III. ①鲁迅 (1881-1936)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8029号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编辑生涯忆鲁迅

赵家璧 著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邮 箱: 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5.125

字 数: 118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320-1

定 价: 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西北大学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29-883029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赵家璧，中国编辑出版家、作家、翻译家。1908年10月27日生于上海松江。在光华大学附中时，即主编《晨曦》季刊。大学时期，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主编《中国学生》。



1932年在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后，进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编辑、主任。其间，结识鲁迅、郑伯奇等左翼作家，陆续主编“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等，以装帧讲究闻名。1936年，组织鲁迅、茅盾、胡适、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分别编选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蔡元培作总序。煌煌十大卷，矗立了一座丰碑。

1949年后，先后担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协会顾问，上海市政协常委。编审。1972年退休，曾获第二届韬奋出版奖。

1997年3月12日在上海逝世。

编辑说明

赵家璧是一位现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作家、翻译家。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入职不久就展现出自己是一位非常有为的青年编辑的才华，他当时利用图书公司阵地，在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郑伯奇等前辈帮助下，广泛联系进步作家群——尤其一些“左联”革命作家，编辑和翻译出版了一大批中外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揭露黑暗，鼓吹光明，鼓舞抗战士气，保存下了不少文化资料，影响巨大。

这三本《编辑忆旧》（三联书店 1984 年 8 月版）《文坛故旧录》（三联书店 1984 年 8 月版）《编辑生涯忆鲁迅》（人文社 1981 年 9 月版）分别是编辑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译出版《苏联作家七人集》“美国文学丛书”、几本外国木刻集等的编辑札记、书信往来以及从业经验谈、回忆录等。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认识历史。

这次整理重版，主要是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讹之处，并针对原版中有关譬如“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的不严谨表述词句根据新规更正为“1949 年前后”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对有关丛书、文库、大系等非书名而是集成的图书，根据新规把原有的书名号《》更正为引号“ ”予以标示。特此说明。

总 序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选集张元济等中国现代出版拓荒者14人之代表性作品19部，展示他们为中国现代出版奠基所作出的拓荒性成就和贡献。这套书由策划到编辑出版已有近六个年头了，遴选搜寻作品颇费周折，繁简转化及符合现今阅读习惯之编辑加工亦费时较多。经过多方努力，现在终于要问世了，作为该书的主编，我确实有责任用心地写几句话，对作者、编者和读者有个交代。尽管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并不是特别有话语权。

首先想要交代的是这套选集编辑出版的背景是什么，必要性在哪里？很可能不少读者朋友，看到这些论著者的名字：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钱君匋、邹韬奋、叶圣陶等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又在“炒冷饭”，又在“朝三暮四”或者“朝四暮三”？如此而然，对作者则是一种失敬，对读者则完全是一种损失，就会让笔者为编者感到羞愧。而事情恰恰相反，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们用心是良苦的，选编的角度是精准的，是很注意“供给侧改革”的。就实际生活而言，对待任何事物，怕的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怕的就是浮光掠

影，道听途说；怕的就是想当然，而不尽然。对待出版物亦是这样，更是这样。确实不少整理性出版物、资料性出版物，属于少投入、多产出的克隆性出版；属于既保险、又赚线的懒人哲学？而这套论著确有它独到的价值。论著者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只读圣贤书”的出版家，而是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焦急民族发展困境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着国家的积贫积弱，民众的一盘散沙，生活的饥寒交迫，列强的大举入侵，和“道德人心”的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不能拯救中国的危局，在西学东渐，重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固守着民族优秀文化的品格，秉承“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使命，整理国故，传承经典，评介新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出版文化事业进行了拓荒性奠基。如果再往历史的深层追溯，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代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胸与志向的使命追求，正如北宋思想家张载所倡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为中华民族这些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思想家们肃然起敬。以张元济等为代表的民国进步出版家们，作为现代出版文化的拓荒奠基者，其实就一批忧国忧民的思想大家、文化大家。挖掘、整理、选萃他们的出版文化思想，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之举，也是为新时代实现古今会通、中西结合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的必须之举。

不仅如此，这套论著丛书的出版价值还在于作者是民国时期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群体，一批立足于出版的文化大家和思想大家；14位民国出版家的19部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未曾出版，具有重要的填补史料空白的性

质，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耕耘者都是一笔十分重要的文化财富之集聚。通过对拓荒和奠基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这些出版家部分重要作品的刊布，让我们了解这些出版家所特有的文化理念、文化视野、人文情怀，反思现在出版人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而忘记出版人的文化使命与精神追求等等现象。

之所以愿意出任该套论著丛书的主编还有一层考虑在里面。这些现代出版事业拓荒奠基的出版家们，其实也是一批彪炳于史册的编辑名家与编辑大家。他们几乎都有编辑方面的极深造诣与杰出成就。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会长，也特别想从中寻觅和探究一位伟大的编辑家，他的作派应该是怎样的一种风格。张元济先生的《校史随笔》其实就是他编辑史学图书的原态轨迹；王云五的《新目录学的一角落》其实就是编辑工作的一方面集大成之结果；邹韬奋的《经历》中，就包含着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心血智慧；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也不乏他的编辑职业之体验；陆费逵的《教育文存》、章锡琛的《〈文史通义〉选注》、周振甫的《诗词例话》等都有着他们作为一代编辑家的风采与灼见；赵家璧的三部论著中有两部干脆就是讲编辑故事的，一部是《编辑忆旧》，一部是《编辑生涯忆鲁迅》，其实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只要你能认真地读进去，你就会发现一位职业编辑做到极致就会成为一位学者或名家，进而成为大思想家、大文化家，编辑最有条件成为思想家、文化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就看识月不识月”。我们的编辑同仁难道不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编辑职业的神圣性而感到由衷的自豪与骄傲吗？

这套丛书真正读进去的话，容易使人联想到正是这一批民国时期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现代出版文化的

开创者与建树者，为西学东渐，为文明传承，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们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努力，他们所举办的现代书、报、刊社及其载体实际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输的重要通道，成为中西文化发展交融的重要枢纽，成为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和探究救国、救民真理的重要精神园地。甚至现代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出版文化的初步形成，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诞生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就是在他们旗下的出版企业担任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的还是他们所在出版单位的作者或签约作者。更多的早期共产党人正是受到他们的感染和影响，出书、办报、办刊而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民国出版家及其拓荒性论著的价值重视还很不够。而这套论著丛书恰恰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所补救，我们为什么不认真一读呢？

是为序。

郝振省

2018.3.20

目 录

总序	郝振省 (1)
给“良友”出版的第一部书	1
——关于《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鲁迅与连环图画	19
——关于《一个人的受难》	
丁玲的《母亲》是怎样出版的?	41
——重见丁玲话当年	
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52
——对审查会的斗争	
鲁迅与周文二三事	71
——关于周文的《父子之间》	
鲁迅·梵澄·尼采	78
——关于梵澄译《尼采自传》	
编选《苏联版画集》	91
——病中口述序文	

推荐葛琴的处女作《总退却》	115
——为什么写序后三年才出版？	
最后编校作序的一部书	125
——关于曹靖华编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	
在鲁迅感召下前进	138
——记鲁迅逝世后出版的几种版画集	
后 记	147

给“良友”出版的第一部书

——关于《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一

鲁迅在三十年代曾大力支持良友图书公司的出版工作，他给“良友”出版的第一部书，是《苏联作家二十人集》。但在此以前，早于一九二八年鲁迅就和“良友”建立关系了。

大革命失败后，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初自广州来沪定居，十八日自共和旅馆移居闸北景云里廿三号。因地近北四川路，曾几次到“良友”门市部购书，店员就告诉了当时主编《良友画报》的梁得所。梁的同乡好友司徒乔常来编辑部聊天，他的早期创作《四个警察和一个女人》，前一年在北平举行画展时，受到鲁迅赏识而被买下，一直挂在西三条胡同卧室墙上。这时他与鲁迅同在上海，时有往来。一九二八年二月廿五日梁得所由司徒乔陪同去景云里鲁迅寓所看望他。他们是为着同一个目的去的。司徒乔约定为鲁迅画像，三天后再去，二星期后画成炭笔素描速写头像一幅。梁得所约期为鲁迅摄影，准备连同司徒乔的画像，编成一组专题，刊登在画报上。根据《鲁迅日记》，三月十六日记有：“晚梁得所来摄影二片，并赠《良友》一本。”

三月廿一日记有：“晚得梁得所信并照相三枚。”这就是我们常见的鲁迅端坐在景云里寓所藤椅上，以成排书架作背景的那幅生活照片，也是鲁迅最后十年开始在上海生活和斗争所留下的第一幅单人摄影^①。其中两幅就最先同司徒乔的速写像，加上转载的一篇鲁迅《自传》，用两个整版篇幅，发表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号的《良友画报》上。

我就在这一年底，半工半读，参加良友图书公司，主编一本图文各半的《中国学生》月刊。一九三二年大学毕业前，已开始编“一角丛书”。“一·二八”事变后，创造社老将郑伯奇来“良友”，文艺书籍的出版方针发生很大的转变，左翼作家纷纷为“良友”撰稿，我已写过专文了。^②秋季毕业后，我专业担任文艺编辑，计划编一套全部收新创作的“良友文学丛书”，准备约请第一流作家执笔，用米色道林纸印，软布面精装，不论厚薄，书价一律九角；试图从装帧、印刷、售价上，对当时流行市上的纸面平装文艺出版物来一个突破。这是个大胆的尝试，总经理伍联德全力支持我去闯一个新天地。

考虑到组稿对象时，第一个想到的作者，当然是最受读者爱戴、左翼作家联盟的旗手鲁迅了。但像“良友”这样商业气息浓厚，一贯以出版画报、画册为专业的书店，是否能争取到鲁迅的文稿呢？我很怀疑。当我和伯奇商量时，他热诚地鼓励我不妨去一试，并自愿尽介绍之责。当时鲁迅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住处是保密的，平时轻易

① 根据《鲁迅1881—1936》图片集，1977年文物出版社版。这一天共摄四幅，三幅坐像，一幅立像，均梁得所摄。1927年10月4日，初抵上海后，曾与许广平、周建人、林语堂、孙伏园合摄一影。

② 《回忆郑伯奇同志在“良友”》，见《新文学史料》总第5期，1979年。

不接见生客。我在伯奇陪同下，于九月初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第一次去谒见鲁迅先生。事先伯奇已为我作了安排，到内山书店时，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了。

关于鲁迅，当时文艺界中人有一种流传的看法，把他当成是一位非常严峻、有时近于怪僻而不易接近的老人。我那时是初出茅庐的青年编辑，刚刚双脚跨出校门，对鲁迅虽怀有崇敬之情，还不免心存畏惧。尤其是这一天去谒见他，希望他为我准备编辑出版的一套文学丛书带个头，这对我一生事业的关系极大，所以一见面，一握手，连话也说不出口。直到鲁迅在前引路，把我们两人带进旁屋二楼内山的会客室坐下时，我才舒了一口气。其实伯奇和鲁迅有深厚的友谊，关于良友公司和我的一般情况，他早已作过介绍，所以坐下后，鲁迅就亲切地问到我怎么爱好起搞文艺编辑出版工作来了。他对我说：“这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自己也是搞过这一行的，其中也大有学问啊！”接着又说，“良友”出版的画报和画册印得都很好，他经常走过我们的门市部大橱窗，总要站着看看。他问起“良友”的营业情况，我告诉他，这是广东商人开的，《良友画报》等各种画册，主要读者是海外侨胞，所以业务很发达。乘机便把设想中出一套“良友文学丛书”的计划向他简单地谈了。他便说：“素来不大出文艺书的‘良友’，怎么忽然要挑这一条路走呢？”伯奇代我谈了我爱好文学，希望在这方面出些好书，“良友”老板已答应另辟一个部分，让我专搞这方面的组稿编辑工作；至于老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扩大营业面，提高书店的名誉地位。接着他为我说出了我们访问的意图，恳求他给我们一部书，以便列为丛书的第一种，带一个头。鲁迅便幽默地说：“你们最好

回去先向老板说清楚，出鲁迅的书是要准备有人来找他麻烦的。”但是接着又笑着说：“现在上海出好书的书店实在不多，经营作风老老实实的更不多见。‘良友’愿意这样做，我倒是可以尽力帮忙的。”我听到这句话，像在暗地里见到了一线阳光，我的顾虑也打消了，胆子突然壮大起来，便把具体要求提出了。因为丛书准备全部发表创作，每册字数平均十五万字上下，所以希望鲁迅能给我们一部文艺创作。

这一下，却大出我们的意外，原来鲁迅手头正有一部即将编成的《新俄作家二十人集》，约二三十万字，他说，如双方同意，可以很快交给我们。但是把翻译作品列为丛书第一种出版，是否会破坏丛书的体例呢？又想到能组织到鲁迅的文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是现成的，立即可用，这么一部唾手可得的译稿，怎么舍得放弃呢？我们问他有无小说集或散文集之类。他说：“小说久已不写，杂文集对你们是不适合的，一开头就害了你们，我是不干的。”在这一情况下，我就和伯奇低头细语，决定接受这部译稿，并破例列入丛书中。于是我们请求鲁迅，为了顾全丛书的篇幅和售价，可否一分为二，各立书名，他点头同意了；并答应将来如有适合给“良友”出版的创作文集，当予优先考虑。于是我们谈了关于版税率、预支版税数字和交稿日期等等，很快取得了协议。回家的路上，我心中说不出地兴奋，不但因为今天一出马，就拿到了鲁迅的文稿，为“良友文学丛书”打开了一条路；尤其是亲身经历的两小时亲切的谈话，发现鲁迅是一位热情诚恳、和蔼可亲的长者，虽初次见面，感到平易近人。他对良友公司这样一个刚刚试图出些进步文艺书籍的书店，既伸出温暖的手来扶植它发展成长，又抱着精心爱护的心肠，不让

它因此而遭到什么意外。鲁迅这种在白色恐怖下，多一个出版好书的阵地，对革命文化事业总是添一份光、增一份热的伟大胸怀，在后四年多我亲身体会的许多事例中，感受越来越深。

二

这次会见的确切日期，《鲁迅日记》并无记载，但九月十一日，鲁迅给曹靖华信中第一次说到这件事。信中说：“近日与一书店接洽，出《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二本，兄之《星火》即收在内，此外有它夫人译的两篇，柔石译的两篇，其余皆弟所译，有些是在杂志上发表过的，定于月底交稿。”据此推测，会见当在九月上旬。从《日记》上看，我们谈妥后，鲁迅于十三日夜，就动手把十篇编为上册，以其中理定的《竖琴》篇名作书名，都是同路人作品。同路人作品共十二篇，因照顾丛书篇幅，有两篇放在下册的最前面。十九日把下册也编完了，以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篇名用作书名；另收无产者作品八篇。上下册字数基本相等。现在查阅有关资料，鲁迅计划用比较法，编译这样一部既介绍同路人，又介绍无产者两个部分的苏联短篇小说集，是在一九二八年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同时开始的。他怀着一颗火热的心，要把这些反抗黑暗统治、争取光明未来的“为人生”的俄罗斯文学的力量，来启发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对于大量介绍同路人作品，鲁迅这样做，在当时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说过：“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从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

的看客一同前进。”^①

他在一九二八年译了《竖琴》和斐定的《果树园》及伦支的《在沙漠上》三篇，后两年又发表了四篇，另有两篇编集时未发表。鲁迅最先翻译的都是同路人作品，他认为作者虽非革命家，却“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炼”，因此有生活，中国读者既可以从中了解十月革命前后的俄罗斯社会面貌，而作者的写作技巧，都是“较为优秀的”。此外两篇同路人作品是柔石生前所译；至于曹靖华译的拉甫列涅夫的《星火》，早在二十年代译者在莫斯科工作时，已应苏联外国文艺书籍出版局之约，在苏联印行过了。

八篇无产者文学作品中，有两篇是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所译，发表时署名文尹，即鲁迅信中所称的“它夫人”。鲁迅所译聂维洛夫的《我要活》，曾发表于《文学月报》，其余五篇，收入文集时都是未发表的原稿，仅在汇编交稿前，重校一遍，作为定稿，究竟何年何月译成的，现已无从查考。鲁迅在该书前记中说：“可惜我所见的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说很有限”，所以仅选八篇。但当他和前面十二篇同路人作品相比时，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是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的事。”寥寥数语，画龙点睛，就写出了一段最值得后人学习的“译者前言”。两书之后还为二十位作家分别写了二十段后记，完成于九月十九日，更是值得翻译工作者学习如何写好后记的典范。

第二天，九月二十日，鲁迅亲自到良友公司送稿来了。我记得那天伯奇有事外出，我们是在门市部后面一间小小会客

① 《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十卷本，下同），第4卷，第335页。